

家信与中国

伊莉莎白·弗雷 (Elisabeth Frey) 在天津
1913-1914 年

吕一旭 古德曼

除了对德国殖民地青岛的研究以外，德国和德国人在中国的存在这一问题无论是在中国研究中还是在德国殖民研究中都基本上一直受到忽视。¹当德国在中国的影响和活动被当作一个研究对象时，其资料来源通常是官方文件、新闻报道和通俗小说，其中大部分的注意力集中在义和团运动。²几乎没人把青岛以外的德国社团，尤其是他们在二十世纪初在中国的日常生活作为研究对象，尽管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中国生活着不少德国人，主要分布在上海、天津和武汉等港口城市，而了解这些人的日常生活对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殖民主义是非常必要的。

这一时期生活在中国的德国人中有一位叫作傅赖义 (Walther Frey)，他是一名建筑师，1905 年来到中国，1938 年离华，曾为北京、天津、上海和太原³等城市设计过一些重要的公共建筑。此外，傅赖义 (Walther Frey) 参与了北京前门的重建、燕京大学的设计、阎锡山军工厂的建设，并在袁世凯的指示下规划了一座国会大厦（最终未能建成）。他的妹妹伊莉莎白 (Elisabeth) 在 1913 年秋天来到天津与他相聚，当时他正在那里为德国罗克格 (Rothkegel) 建筑公司工作。

伊莉莎白 (Elisabeth) 没有明确说明她旅居中国的时间长短。在一封信中她表明她的停留时限是三年，⁴但同时她并没有设想过一个确切的回归日期。因此，她既不是以期望很快就能回家的游客身份，也不是以想在他乡建立新家的移民者身份来到中国的。她曾不止一次在信中表明，她对有无合适婚姻的这一问题一点也不感兴趣。她也没有肩负任何到国外履行有助于“公共利益”的官方职责。但她到中国来旅行也不是单纯为了寻求快乐，而是要帮助她的单身兄长料理家务。由于战争的爆发，她在中国的停留被突然打断了，在日本占领青岛后，她于 1914 年 12 月初撤离了天津。

在旅居中国期间，伊莉莎白定期给她远在斯图加特的母亲写信。她在 1913 年 9 月 21 日至 1914 年 7 月 7 日之间所写的 31 封信件被她的家人保存下来，这些信

¹ The most recent example of this negligence is the volume *Germany's Colonial Pasts*, ed. by Eric Ames, Marcia Klotz and Lora Wildenthal, Lincoln (USA)/London 2005.

² *Das Deutsche Reich und der Boxeraufstand*, ed. by Susanne Kuss and Bernd Martin (Munich 2002); Yixu Lu, 'German colonial fiction on China: The Boxer Uprising of 1900', *German Life and Letters*, 59 (January 2006), pp. 78-100.

³ 他的逗留时间比不是连续的。他从 1914 年 11 月起大约有 4 年半的时间被关在日本的监狱中。

⁴ 她在 1913 年 10 月 26 日的信中明确表示，她希望回去参加她的兄弟 Paul 的婚礼。

件提供了从不同寻常的视角来考察两种文化的相遇，并且挑战固有分类的现象的机会。毋庸置疑的是，其家庭与中国的长期接触——其另外一个兄弟也在中国的一个德国公司工作——影响了信件的内容：什么在信中谈到了，什么没谈到，什么被详细描述，什么被忽视。

伊莉莎白的信很有规律、篇幅长而且是连续标号的。很清楚，她在谋求一种叙述的连续性，就像人们所期望的书信体小说那样。但在此之下，她并未表现出任何艺术自负。她使用一种流畅的土瓦本白话文风格书写信件，并且她并没有怎么考虑到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Bildungsbürgertum）的读者期待，尽管她本人明显属于这一阶级。一方面，伊莉莎白的信件与当时的书信体小说具有相似之处——例如并不取决于家里回信内容的持续十个月以上的独白；给一些信件起标题以使它们产生类似连续通讯报道的效果；在描绘引起她兴趣的事物时极具生动性。但另一方面，信件的关注点严格集中在家庭和国外移居者的环境上；除了她兄弟的信以外，她没有参考任何关于中国的书面资料，并且极少描述她所在的这片异国土地，尽管她具有相当杰出的描述水平。这又使得她的信件明显区别于任何以唤起普通读者兴趣的文学作品。

既然这些信件既不仅仅是写给某个特定人物的通信，也不是针对普通读者的文学作品，体裁问题就出现了。在 1914 年 2 月 1 日写于上海的信中，伊莉莎白（Elisabeth）提醒她的母亲，要为她的特别目的而妥善保存好她的信件，因为它们是她给自己制作的一份“美好的”纪念品。⁵ 因此这些信件至少有两种十分独特的作用：它们既是她的日记同时也是她给在德国的家人所写的旅行见闻。这样的双重作用必然会对体裁问题产生影响。

使伊莉莎白的记述与当时依旧流行的书信体小说可以相提并论的是一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它具有一种方向：她的书信成了关于“上层中产阶级的女儿”的成功故事，伊莉莎白在中国的移居环境中获得很大的发展机会。在斯图加特她所出入的社会圈子里，她这些解放性的冒险活动是不可能发生的。当通信中断的时候，她已经达到了自己社会成功的顶点，所以她整个叙述的结构与书信小说相类似，只缺少一个“门当户对的婚姻”这种高潮结局而已。一战爆发后，伊莉莎白同其他德国妇女和儿童一起撤离了中国。遗憾的是，她在中国最后五个月里所写的信件被遗失。

这样，体裁问题转变成了两组问题：第一组是叙述视角问题；第二组是面对中国时的文化姿态问题。叙述视角更多地与她在写作这部连续的、持久的、非凡的记述过程中她个人内在的决定因素有关。文化姿态与她的殖民社团成员身份有关。对于欧洲殖民者来说，1900 年义和团运动之后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的中国是一种很特殊的环境，暴乱的危险似乎已经被永久消除，没有什么会威胁到殖民事业的稳定增强。这种环境也将影响到她的文化姿态和对中国的态度。

这两组问题并不是完全分离的。有时它们在信件中相互交迭，有时又背道而驰。从理想状态说，研究这些书信应以同时代类似信件为背景。但由于（目前）

⁵ ‘Du hebst mir die Briefe doch alle auf, gelt! Es ist doch eine schöne Erinnerung für später.’ (Shanghai, 1 February 1914)。

没有那样的信件可得，只能参照另外一批关于中国的德语作品，即当时创作量很大的小说。

最简方案，是以两部二十世纪早期由女性撰写的以中国为背景的德国小说为对比框架。一部是伊莉莎白·冯·海靖 (Elisabeth von Heyking) 所著的《他未收到的信件》(Briefe, die ihn nicht erreichten)，该小说最初匿名发表于 1903 年，是在随着 1897 年德国在青岛建立殖民地而开始的以中国为背景的写作洪流中取得最大商业成功的作品之一。到 1925 年它已经再版了一百多次，而且它的作者也因此成名，⁶可以与伊莉莎白·傅赖义 (Elisabeth Frey) 进行比较的一点是，冯·海靖 (von Heyking) 曾经在中国生活了较长的时间，从 1896 至 1899 年，也同样身处那儿外国移居者社团的天堂之中，因为她的丈夫是德国驻清廷的特使。但是她的小说是一个结尾于义和团运动的悲剧爱情故事，1903 年在她丈夫下任外交使节的驻地墨西哥写作完成。令人十分惊讶的是，尽管冯·海靖 (von Heyking) 的小说流行了二十多年，但没有迹象表明伊莉莎白曾经读过这部小说。冯·海靖 (von Heyking) 的小说跟伊莉莎白的信件之间的强烈对比在两种意义上很有用。第一，冯·海靖 (von Heyking) 的小说使我们得以看到伊莉莎白的写作在什么地方明显相异于要进入市场的作品。第二，冯·海靖 (von Heyking) 的小说对欧洲在中国的殖民活动持批判态度，这与那些年关于中国的德国小说中流行的思想状态完全相逆，以至于这一因素——与作者的社会地位相结合——可以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其最初匿名发表。直到该小说成为畅销书后，冯·海靖 (von Heyking) 的名字才出现在扉页上。

另外一部小说是 1900 年阿格丽丝·哈德尔 (A. Harder) 所著的《与黄龙的战斗》(Wider den Gelben Drachen)，这部小说是德国个人发展小说的一个沙文主义版本，并且更符合 1897-1914 年间以中国为背景的殖民小说的主流。⁷将这部小说也纳入对比框架可显示《他未收到的信件》(Briefe, die ihn nicht erreichten) 一书是何等地偏离了同时代大多数关于中国的小说所表现出来的文化姿态。

就文化姿态而言，要将伊莉莎白对中国的描述与《他未收到的信件》(Briefe, die ihn nicht erreichten) 对比，不仅要考虑私人信件与市场化小说的区别，还要考虑到冯·海靖 (von Heyking) 的小说背离了主流文化态度，那种文化态度在《与黄龙的战斗》(Wider den Gelben Drachen) 一书中则强烈地传达出来。因此由伊莉莎白的家信所引发的体裁问题，涉及到一个三角度量的过程。虽然这个比较法并不能声称精确，但要优于那种不考虑背景只关注作品本身的做法或者那些研究德国在中国的殖民活动的专业历史学家们的著作，后者通常以牺牲特殊性为代价而集中关注普遍性。

伊莉莎白书写中国

⁶ Changke Li *Der China-Roman in der deutschen Literatur 1890-1930* Regensburg 1992, pp. 104-115.

⁷ Yixu Lu, 'German colonial fiction on China: The Boxer Uprising of 1900' in *German Life and Letters* 1/2006, Oxford.

伊莉莎白的首要任务是给她在天津的哥哥料理家务。这构成一项艰难的挑战，也是为什么她信件的中心问题多集中在家务事上。其它原因也存在，我们将在文章的下一部分进行探究。但是从一开始，家务便是中心焦点问题，而她所在的异国环境则非常地处于边缘。这使得与中国仆人有关的问题非常突出。她来到之后发现了令人不满的情况，并且这种情况持续了好几个月。她对哥哥鞭打一个不能令人满意的“苦力”的行为的漫不经心的接受，以及她对那个仆人当时给予辞职告知的评论，都突显出一种持续挑战着她的文化分割：

东西必须要慢慢移动，否则男仆将被辞退。我会对此遗憾的，他看起来是如此的清洁整齐，但是我并不想给予太多的称赞。当瓦尔特(Walther)在病中的时候，他用一记耳光解雇了“李”苦力。瓦尔特(Walther)发现，他从厨房拿来玻璃器皿并放在餐具柜上，然后检查它们是否干净。似乎一些器皿没有干净到让他满意，他冲着灯光举起它们，并用自己的舌头舔掉了上面的灰尘，然后用自己的夹克擦拭它们，直到它们闪闪发亮为止。这一行为引起了另一件大事，Walther给了他一顿适当的鞭打，以致他随后宣称他已丢了“脸面”，不能再留下来为我们服务了。⁸

三个月之后，她对德国清洁标准的坚持仍然带给她巨大的挫败感。

我仍不完全满意我的厨房，就算是它干净多了，新的成套餐具也确实看起来好多了，但是仆人们依旧是一群肮脏的人！东西从来不能得到合适的清洁，如果你向他们其中一人要勺子或其它东西，他会从抽屉里拿出来，但是，担心着这东西可能不干净，他会用他自己的抹布再擦一遍，而他的抹布更脏得多。然后他会对自己很满意，并继续想他是多么的干净！……我能让这些粗鄙的人明白吗？……我们不得不再洗一遍餐具，当然过滤器也是脏的，因为只有需要的时候才会清洗它……我告诉他们我半小时后会回来，但等我回来时却发现一个人也没有了。我不得不自己洗完卷心菜，但是当事情处于这种状态时，你所能做的就只有一笑了，你难道不同意吗？⁹

不仅在伊莉莎白的信中，而且在当时大量流行的关于中国的德国作品中，卫生问题都是一个困恼的主题。语言问题只是偶然地闯入了下面对六个月后发生在厨房里的一次暴力口角的描述中。几乎不会讲汉语的伊莉莎白，正在给只会说汉语的仆人们下命令：

星期五不得不再次喝斥了厨师！我告诉他应该把所有的东西都清理干净，然后用干净的纸给架子粘上新的白边—你知道，我们在家里是怎么粘花边的。于是他把纸剪成一些长条，虽然不是很均匀，但是仍然干净。……但是当我出去之后，他却什么也没做，虽然给架子粘上了新的纸条，但污垢依然留在架子上。这使我感到极度狂怒；我叫他进来并且撕下了他所做的一切。你应该看看他的眼神！然后他不得不把所有的东

⁸ 1913年10月7日由天津寄来的信。

⁹ 1913年12月16日由天津寄来的信。

西从架子上拿下来；他愤怒了，将东西猛放在桌子上。接着我向他表示，如果他再这样做我将抽打他一下——他只说汉语。毫无疑问，当他再次猛放东西时，我抽打了他的手，并用简单的土瓦本语告诉他：如果你现在不停止这种动作，我将把主人叫来！这奏效了——瓦尔特(Walther)早就给过他一记耳光了。最后，他不得不开始好好整理和打扫，直到最后任何地方都没有了污垢……噢！这些中国人!!!——有时你不得不发泄一下才能觉得好受些。¹⁰

又一次，暴力和威胁进一步使用暴力成为跨越语言的障碍唯一工具。在这封信背后存在着复杂的文化相互作用。这个仆人尽最大努力去执行一项他一定觉得非常古怪的任务来取悦对方。由于他在某种程度上不明白而违背了关于清洁的命令，伊莉莎白勃然大怒。仆人以相似的情感来回应，而伊莉莎白不仅打了他，还援引她的兄弟作为进一步惩罚的来源。

叙述视角和文化姿态两者合而为一，表达了伊莉莎白的主导意图，即她要在中国建立一个完全的土瓦本家庭，而毫不顾及当地的风俗和当地的烹调习惯。在她刚来这里时，在1913年10月8日出席了一场正式的中国宴会，并且详细描述了这场场合。她发现部分食物可以吃，其余的食物则让她感到害怕。但是她从头到尾的态度主要是对当地风俗容忍性的蔑视。好像预计到可能会有人问她是否会喜欢这种场合，她以消极的语调坚定地总结说：“好吧，这很有趣，但是我不想经常这样做。”¹¹她没有记述任何类似的痛苦经历，在她以后的信中她曾又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提到一顿中国饭，但只寥寥几笔带过。¹²在她的厨房里，让她的任何厨师准备任何当地菜肴都是不可想象的。

她的仆人们来来去去，或被解雇，或辞职，她从未将他们当作个体，总是以他们的功用而不是以他们的名字来标识。确切点说，他们是因引起的事件而被识别的，不管是滑稽的事还是令人愤怒的事。他们实质上是一个正在发生的、永远也不能真正解决的问题中的一部分，尽管她没有思考其原因是什么。只有一次，在1913年11月28日的信中我们确实发现了例外。她为一个男仆支付了一次小手术的费用，以确保仆人的持续性。没有迹象表明其他殖民者家庭采取了不同的方法。不雇用仆人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他们所构成的问题却只能通过冲突或挫败的形式来处理。

《他未收到的信件》(Briefe, die ihn nicht erreichten)一书对中国仆人们采取了较温和的、沉思的观点。该书主角由她的中国仆人“他”(Ta)陪同去美国，是在美国的生活才使她的中国仆人真正进入了她的生活：

与在北京的时候相比，在这儿他对我们的态度较少保留，在北京我们并没有真正了解我们的男仆们的生活。我们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总是在那儿，他们默默地工作，准确知道我们所有的小习惯——但是一旦他们离开我们的房子走到街上，他们便消失在一个我们所不了解的世界

¹⁰ 1914年6月16日由天津寄来的信。

¹¹ ‘Na, intressant war es, aber oft möchte ich es nicht mitmachen.’

¹² 1914年5月20日的信。

里，并且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任何关于他们这部分生活的消息。只有当他们希望获得比通常请假时间更长的假时，我们才会被告知他们的母亲或父亲要死了。最初我很被这些事情打动，我总是会让他们抽出时间，甚至还会给他们提供药品。但是他们简直有太多的要死的父亲和母亲们——我的同情心被召唤的次数太多，以致最终耗尽了。¹³

对照伊莉莎白士瓦比风格浓烈的愤怒抨击来阅读这部写作优美的小小说是有启发性的一如果带着适当的谨慎的话。因为这部书信体小说是一个以悲剧结尾的爱情故事，叙述视角从一开始就倾向于伤感的优雅情感。这与伊莉莎白那种毫无拘束地向她妈妈所发泄的挫败感是完全不同的。

撇开这些差异不谈，仍然值得看一看两位作者构建“仆人问题”的一方法。冯·海靖 (Von Heyking) 没有不合格的仆人，而伊莉莎白则正相反。不过，冯·海靖 (Von Heyking) 让她的叙述在“同情心耗尽”上达到了顶点，这是针对一个积习难改的毛病：请长假。而这样一个缺点完全可能引起伊莉莎白大发脾气，冯·海靖 (Von Heyking) 把消极情绪限制在一个组成部分，在这部分，怀疑取代了同情。

两部记述都使得殖民女主人对她们中国仆人的工具主义态度变得清晰起来：一旦仆人将任务完成，他们便不再作为个体存在，除非需要他们时他们却不在而使得（主人）失去耐心。然而，冯·海靖 (Von Heyking) 将此作为沉思的对象并且暗示这有一些不对之处。伊莉莎白则一点儿也没有考虑到她对作为人的仆人们毫不了解而有何问题，仆人们总是构成家庭秩序不稳定的源头，而她则必须不惜任何代价维持家庭秩序。好奇心就此止步。

这并非是要刻意贬低伊莉莎白。一些记述自己日常生活的信件自然与一部以刻画一个要博得温和的读者们同情的小说人物有不同之处。而且小说也能够同样容易地转向相反的一面：在《与黄龙的战斗》(Wider den Gelben Drachen) 一书中，来自德国的主人公被他的仆人阿峰 (Ah Fong) 杀害，尽管阿峰 (Ah Fong) 是一个被德国传教士搭救并养大的孤儿。¹⁴像这样的主仆之间的谋杀关系在围绕义和团运动的德国通俗小说中非常典型。但是直到义和团危机过去很久的 1913 年，如果一个仆人因为挨打而感到丢脸并从而辞职，那也只不过意味着德国主人需要再找一个后备仆人，仆人充其量只不过是不可靠的家庭机器而已。

这些记述清楚地表明，德国殖民者与中国仆人之间的关系通常被误解和冲突所折磨，并且殖民者特有的反应是通过尽可能工具化的方法来对付仆人们的缺点。这是殖民写作中常用的比喻手法，并非独特地存在于德国作品中。伊莉莎白之所以显得突出，是因为她没有想到她或许应对她所处的环境做些询问或了解。而冯·海靖 (Von Heyking) 知道这一点，所以她让她小说的主人公预示可能会对此进行考察，然后又以她的读者所喜欢的方式温婉地解答这一问题。

无论家庭前沿的“仆人问题”被以何种面貌呈现出来，这一问题都与殖民列强在商业和外交领域的挫折以及竞争不无关系。伊莉莎白漫不经心地接受了哥哥

¹³ *Briefe, die ihn nicht erreichten*, 75th printing, Berlin 1904, p. 67f.

¹⁴ A, Harder, *Wider den Gelben Drachen*, Bielefeld and Leipzig 1900, pp. 528f.

对仆人实施体罚这一做法，这是中国人被欺压而反抗则被视为傲慢无礼的这样一种大环境的一部分。冯·海靖（von Heyking）则拥有认识最高层外交圈的有利条件，她谴责那种认为中国人的存在只是为欧洲人作配角而的观念：

……被暴力驱策进入所谓的进步，因让正遭受深重剥削的自己接受另一方较轻的剥削而受到惩罚。每一方都迫使中国人对其他方的要求作出强烈反应，不要对其他方让步，但是在决定性的时刻，中国人总是被弃之不顾……没有任何地方像北京这样让我学会蔑视成功，因为我曾近距离地见识过成功是如何取得的：一些通过行贿；一些通过残忍的武力。……他们[欧洲人]特别是年轻的欧洲人沉醉于他们超人一等的观念中，这一观念源于对所有中国事物的无限蔑视。他们鼓吹说，人应该只顾自己，拿取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只按照自主道德的要求做事，因为这是使得民族强盛的唯一途径。¹⁵

冯·海靖（von Heyking）对殖民主义在中国的抨击与伊莉莎白在天津的家务生活相距非常遥远。义和团运动前夕殖民者在北京的狂妄情况，没有再现在伊莉莎白生活的天津。因为冯·海靖（Von Heyking）以 1903 的视角写作，其预先设定的结局是个双重灾难：主角的未婚夫在义和团运动中丧生，与此同时，当时流行的对待清廷的态度也崩溃了，所以她的小说能够从这些角度对殖民剥削进行思考与批判。伊莉莎白的家信写于十年后，由于没有即将出现的威胁，她的叙述视角决定了她的故事呈现出另外一种方面。

伊莉莎白从一开始便认为，她在中国将获得成功。“仆人问题”对她来说基本上是慢性烦恼，而并非大范围不适的征兆，因为她并未预见到殖民形势的崩溃。她被保留下来的最后一封信写于 1914 年 6 月上旬，显示出她并未意识到战争的威胁。其时间视野与冯·海靖（von Heyking）所精心制造的紧迫的时间视野相反，但是欧洲殖民者将中国人视作下等人的态度在经历了义和团运动后仍旧完整无损，并仍然决定着二者之间在日常生活中的相互关系。

伊莉莎白关于中国的书信并非仅局限于家务事，她对中国艺术形式的选择性接触值得一看。伊莉莎白是一个音乐爱好者，唱歌很好并且能够弹奏吉他和钢琴，但她与京剧形式的中国音乐的邂逅，并不比她第一次参加中国宴会的情形成功。在愉快地游览了天坛（此事随后再谈）之后，在返回的路上她又观看了一个戏园，但结果令人遗憾：

我不会很快忘记今天中午的！在我们回家的路上，我们经过一个中国戏园，当然我要去看看。你想象不出来我们发现它是多么的愚蠢和不可理解！并且歌唱如此丑陋！你知道，女人角色由男人扮演，并且他们总是用假声演唱——这噪音足够让你发疯！Oberlein和我很快便受不了。当他进来的时候，我们被注视了大约五分钟，好像我们比舞台上的表演更令人感兴趣。¹⁶

¹⁵ *Briefe, die ihn nicht erreichten*, p. 32ff.

¹⁶ Letter, On the train between Jinan and Pukou, 9 January 1914.

伊莉莎白相当高的叙述才能用几句话囊括了大量的信息。异国的艺术形式立刻遭到了拒绝和轻视。由男人扮演女人角色演唱这一行为之所以让她如此震惊，是因为她并不知道在几个世纪的欧洲歌剧中也存在着一个同样的长期传统，由被阉的男歌手演唱女性角色。给这次经历打上封签的是，伊莉莎白和她的男同伴们自己变成了好奇心的对象。自己在这样奇异的景观中变成了一种景观，这最终触犯了她的敏感性，于是他们赶紧离开了。不同的因素在这里汇聚在一起。她之前刚对一项中国建筑成就赞叹不已，又鉴于她自己有相当好的乐感，这可能会使得她与京剧相遇时不那么震惊。但是并非如此。这次经历让她此后不再接触任何中国音乐，包括不那么具有挑战性的音乐形式，例如民间歌曲和琵琶。其原因并非全然是京剧与西方音乐文化之间的差异，而是她在何种情况下接触了这种完全不同的音乐文化。伊莉莎白和她的同伴在戏院并未感受到娱乐，反而变成了他们眼中的低等文化者们的一种娱乐。这种传统“殖民凝视”的逆转加深了她的异化感。。

其他信件显示出伊莉莎白习惯于在各种情况下被注视—曾经有一次她是一列拥挤的火车上唯一的欧洲人—但这些事件她往往都轻而易举地应付了。在上边这段尖锐刺耳的记述背后显然存在着对情况突然逆转的震惊感。没能行使殖民凝视中高高在上的、控制性的优越感，她和同伴突然变得“更令人感兴趣”，言外之意，对她周围的人来说他们比舞台上的表演“更奇异”。她无法不感受这种处境的怪异与难堪。难得见到伊莉莎白在信中露出薄弱之处，但是这段话中的愤怒似乎显示出她无法应付这样的场合。

当然，这是推测。当时她已经到中国有几个月了，并且没有办法确定她是否之前接受过任何关于对京剧应抱何种期待的告诫，以及这些告诫是否决定了她的经历。但是，她自己变成景观中的景观造成创伤的确有一定说服力。

在她的叙述中看不出她阅读过有关中国的书籍或译自中文的作品。毕竟，德文报纸在中国已有出版，并且在中国也不缺乏德文书籍。她似乎对异国事物漠不关心，唯一例外的是建筑，这是易于理解的。她的父亲是一位建筑师。她的七个兄弟中的两个，其中包括与她住在一起的哥哥瓦尔特（Walther）也是建筑师。看着中国建筑的杰作，伊莉莎白陷入了真正的幻想。就在她描写观看京剧的那封信中，她也描写了她游天坛的经历，当然这段描述是在关于京剧的那段描述之前：

Oberlein本来要邀请我，但是男仆给了他错误的信息并让他离开了。但是他的确在中午接上了我，我们驱车去了天坛。天坛大约离北京有半小时的车程。非常宏伟壮观，并且天气也一样的好！你知道像这样的建筑得用四只眼睛来欣赏，因为两只眼睛不足以全面欣赏它的美丽。当我站在巨大的大理石祭坛上，看到美丽的寺庙一个接一个的伫立着的时候，我似乎就像处在神话故事当中。漆瓦在阳光的照射下如此闪耀，闪着蓝色、绿色和黄色的光。然后，每一座寺庙四周的围墙上都涂着一种漂亮的红色油漆。当然，还有大量的镀金，白色的大理石，蓝色的天空，绿色的树木—你甚至可以说是树林（高高的松树和雪松）—所有的色彩相互映衬，在任何地方也没有比这更美丽的了！我禁不住一直想着赫尔曼（伊莉莎白的另一个哥哥—作者）—这样的

景色会让他感到多么的快乐啊。¹⁷

1914年3月30日，她参观了一个华人墓地，画了一幅坟墓的素描图并附上了详细的文字描写。这并非是出于对旅游景点的热情，相反，这和傅赖义一家的特点相一致：建筑让他们本能地着迷，因为这是共同的关注点。在这方面，她对游览北京市郊所作的记述值得注意：

我仍然还没有写关于北京的任何东西，但是你已经Hedel的信中全都读到了。我们在那里度过了几天极好的时光。我唯一感到遗憾的是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花在南口关（Nankau Pass）上。但这不是世界末日，我希望以后某个时间还会来这里。你知道，没有什么比长城还要壮观的了，我真希望你能在这儿和我一起欣赏它。想象一下，在高高的山峰上修建这样一座城墙要耗费多长的时间呀！简直不可理解他们是怎样做到的。我们游览的明陵也很漂亮。我总是想起Hedel和我骑着驴子走在美丽的早上的情景，Rothkegel小姐则坐着轿子—前方总是呈现出可爱的山景，陵墓周围则围绕着漂亮的树—几乎是树林—很壮丽。灵道两旁竖立着三十六尊雕像，宏伟的大门，让你吃惊得说不出话来。……去颐和园的旅程也同样壮观，而且我们总算看到了那一切，是多么幸运呀。如果Hermann能看到该有多好。—在上午阳光的照射下所显现出来的所有的颜色效果，非常华丽。我们也一起去了天坛—这是我最喜欢去的地方之一，但是你一定要在天气好的情况下欣赏它—在黎明或黄昏之时—那时它美丽无比。我们还参观了黄庙（Yellow Temple）—你知道，你可以从北京到你喜欢的任何地方进行无尽的远足旅行。在天津，我们没有这么多选择。我不得不说，如果瓦尔特（Walther）有很多在北京的业务，以至于我们必须搬到那里的话，我会很高兴的。¹⁸

在这里我们也许能找到一些迹象，来解释为什么伊莉莎白对她所看到的東西描写得非常少。而当她确实进行描写的时候，也与冯·海靖（von Heyking）精炼的文学再现有很大差异。不过她对风景、形式、光线效果和颜色有非常清晰的认识。但是在上边这段文字中，有两次她把进行建筑物和风景描写的工作交给被昵称为“Hedel”的妯娌来做。这也许是因为尽管她很欣赏某些风景或建筑并且也能够描述得很好但却很少下笔。她强调，第一，“Hedel”已经写过关于北京的东西，这可以让她从这项工作中解脱。第二，她暗示让“Hedel”对明陵进行记述是非常合适的，因为她将在暑假返回斯图加特并能提供第一手的报告。

在这里与《他未收到的信件》（Briefe, die ihn nicht erreichten）一书作个比较是有启发性的。这部书信体小说的人物特意叙述自己和远方的朋友都熟悉的场景，表面上是作为克服彼此相分离的痛苦的方法。进一步看，这些记述描写是为匿名的读者们准备的，那些读者们购买小说并且可能相当期望看到异国场景填充于这个爱情故事之中。与之相似，对中国采取了相反文化姿态的《与黄龙的战斗》（Wider den Gelben Drachen）一书，极尽铺张地描述了一个完全处于颓废

¹⁷ Letter, On the train between Jinan and Pukou, 9 January 1914.

¹⁸ 1914年6月16日由天津寄来的信。

状态的国家，甚至把北京贬为仅仅是一座围有古城墙的巨大粪堆。¹⁹其目的是让读者确信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是一种拯救中国的高尚行为，其叙述轴心因此是呈直线的。在这两种情况下，对异国情景的描述都是非常需要的，以迎合一般读者的期待，并给与小说情节一些节奏。而节奏在伊莉莎白篇幅很长的信件中简直没受到关注。

在另一方面，有几个看起来是自然产生的、没有受到上边谈到的因素影响的例子。其中之一是参观芝罘一家缫丝厂。²⁰这从通常的不满于街道上的污物开始。接下来非常栩栩如生地讲述了对缫丝厂的参观。煮沸的蚕茧所散发出来的臭味使她只往里边走了几步就转身而退。这看起来似乎正是第一手记述——“这种臭味附在我身上大半天。”尽管她对芝罘景色的结论具有某种众所周知的固定形式的性质：《芝罘唯一吸引人的部分是领事馆一带地方，其次是一个可爱的海滩。我们非常高兴乘船返航》。

尽管很直接，但这一情节却让人迷惑。伊莉莎白在缫丝厂里边只呆了短短的时间，然后就被臭味熏了出来，但她能出色地描述缫丝过程，鉴于她没有照相机，要么她确实呆了更长的时间来观察，这样的话，臭味的影响被胡乱地夸大了，要么她事先知道将会瞥见什么，所以才能够描述得这样仔细。结局也具有一定的可预测性：只有芝罘的领事馆区是清洁的，并且在一片原始纯洁的海滩上引出了脱离这整个情节的出路。

这一迷团的一个线索可能在于芝罘是处于英国支配下的港口这一事实。在1914年4月，伊莉莎白无意于强调殖民列强中的民族竞争，但是对于“模范殖民地”青岛仍然投入了巨大的德意志民族的骄傲。在这片绿洲中，中国惯常的污秽已经被清除。她唯一一次对青岛的游览是芝罘震惊的理想对照。

……上午九点我们到达了青岛，Augustesen先生开车来接我。Lauterbach上校也和我们在一起。Augustesens家有一座非常棒的能够看海景的房子——很迷人！当我从我的窗户向外看的时候，早晨是如此美丽。……九点钟，Augustesen先生再次用车来接我，他带着我游览了青岛的一切及其近郊。我真的很喜欢这里，一切都如此干净，让我想起了家乡。美好的公路、山峰，树林，海滩，你所期望的一切……²¹

青岛德国殖民地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她一直试图在天津自己家里实现的一切：“一切都很干净，正像在家一样。”在青岛，有可能短暂地忘记殖民优越感所必须的距离。

伊莉莎白对芝罘的污秽和臭味如此自然地表现出来的殖民姿态问题被另外两段插曲强化了。它们有一种象征意义，因为它们演示了“殖民凝视”最通常的形式。

伊莉莎白和她的另一个兄弟在上海度过了1913至1914年的新年，这个兄弟

¹⁹ *Wider den Gelben Drachen* p. 30.

²⁰ 1914年4月15日由天津寄来的信。

²¹ 1914年4月15日由天津寄来的信。

当时在上海为德国拜耳公司工作。她记述了一次不愉快的独自一人在南京下火车转轮船的旅途经历，她着重描写了她所陷入的当地人的“臭味”和她面对的完全混乱的情景：

……你们在家里的人简直不能想象在这样的火车站会发生什么样的情景。一片混乱！你可能会以为进入了屠宰场，但是，实际上，正在发生的事情是每个人都在抢着把他们的行李和家人从一列火车上转移到另一列火车上。除了我之外我只看到了一个欧洲人。他在等着乘坐渡船过河—除此之外周围全是中国人。从火车站步行到码头大约有五分钟的路程，但是我们等了半个小时才看到汽船过来，当它停泊后，我们花费了很长时间才得以没受损伤地通过障碍。其间充满了推推攘攘—还有殴打—一些中国人不得不忍受警察非常猛烈的棍棒抽打，因为当我希望通过时，这些中国人没有给我让开路。在这方面，警察表现得很好。在渡轮上我找到了一个正好在十字路口前面的位置。位置很棒，风吹过你的耳朵，让人感到非常清爽。尤其是在经历了火车上的污浊空气和与散发着臭味的中国人一起等船之后，真的让人感到特别高兴！²²

如果说她在家中把暴力作为对待自己仆人的最后手段似乎尚可以被接受的话，那么一个现代读者一定会为这一事实而震惊，她认为（中国）警察为了让她穿过大群的中国旅行者，用棍棒打他们来给她开路的做法是正确的、合适的，只值得不经意的一提。这似乎是最不人道的殖民主义姿态。但是这不是惟一的例子。回到天津之后，她又记述了一场发生在天津中国人区的火灾。一天深晚，她和她的哥哥正在休息，一个朋友（Oberlein）来邀请他们去看火灾：

午夜之后，正当瓦尔特（Walther）和我非常舒服地穿着和服躺着看书时，门铃响了。那时我正想睡觉，Oberlein来了，并且带来了一个消息，在中国人城区里有一场巨大的烈火—这确实引起了我们的兴趣。我们立刻换上外出的衣服，坐着黄包车赶往着火的地方。从远处你就已经能够看到天空中巨大的光亮，离得近了就更亮了！你真的应该看到！我从未见过这样巨大的火海—简直太精彩了！一座装满了一捆捆茅草、煤等东西的仓库着火了，还有至少五十到六十包堆积在一起的被席子盖着的货物。当然所有近邻的房子也着了火。每次风一转向，就会有另外的房子着火。看起来很新奇！我们在那里站了几个小时。而且还有中国消防队的愚蠢行为！我们几乎快笑死了。他们没有把时间浪费在用水灭火上—他们的大多数人只是拿着火把站在那里，并且他们有至少五十多面旗帜在微风中飘扬，与此同时他们用铁盒子的哗啦声响搞出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喧嚣，以驱除恶魔。大约一点钟左右，刮起了一阵劲风，让火势更大了，整个人群再一次举起旗和火把，在大火周围列队行进，自始至终喊叫个没完。到那时消防队已经来了，他们用汽泵，中国人用手泵，成功的击退了火势—当我们在两点钟回家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他们已经将火势控制住了。²³

²² 1914年1月19日由上海寄来的信。

²³ 1914年6月16日由天津寄来的信。

到中国八个月后，伊莉莎白已经如此习惯于将中国人当作异类看待，以至于她在这种灾难中只看到娱乐。她根本就没想过，生命可能正被夺走，尤其是当风力加强、火势复苏的时候。娱乐的中心点缀是中国救火员的滑稽动作。“我们都快笑出病来了。”引起欢笑的是，伴随着使用欧洲人的救火技术，他们迷信地敲着锣挥着旗一再次显示出中国迷信猖獗！在这里，就像在南京火车站一样，殖民凝视似乎排除了所有的移情作用。她一点也没意识到这可能存在问题。在她和她的兄弟及其朋友 Oberlein 回到家后，他们花了一个小时来解渴、聊天，她用这样一句话结束了这一幕：“这就是我们今晚的经历，太棒了！”

伊莉莎白不应该被挑选出来作为特别无情的人，只不过是她的私人信件碰巧被保存下来了而已。殖民主义者对广大受殖者一直具有优越感，即使在天津这样不具有同青岛一样的殖民管辖权的地方也如此。这种优越感完全阻塞移情作用。在她的家庭和日常打交道的外国移居者团体圈子中，伊莉莎白是个热心人，对她的同侪热情忠诚，从她的家信中也可以看出来是这样。问题在于，从一开始，中国人便没有成为她同侪的可能，她不可能意识到她对作为人类的他们有多冷淡，甚至在直面他们的苦难的时候。当她的确送一个仆人去做小手术的时候，她的明确动机不是同情，而是为了避免她的家庭日常事务不会因此而被长期打断。不管人们怎么想，都不能断言对她适用被大为·斯普 (David Spurr) 归因于 20 世纪当代传媒的减轻效果：

这种形象特有的视觉框架和隐喻性转化具有化近为远的效果：在唤起对苦难关注的同时，它们也远化苦难，将它遏制、划定、地方化于一个被理解为文化上分离的领域之中。[...]现代传媒技术使我们疏远了外国和遥远地方的真实情况，因为现代媒体技术轻松地创造了那个世界的形象。形象是随意制造的而且能够在翻页的时候或拨动按钮的时候消失。[...]读者因此被免除了责任；罪行已经被确认，权力机构已作出通告。有技巧的表达顺序弥补了读者不能把这些大批量生产的形象吸收进个人经历结构中的缺陷。²⁴

伊莉莎白的信件提供给我们与之相反的情况。警察在火车站用棍棒为她开道，她根本没想过中国人是否在这一过程中有否受伤的问题。当她和她的兄弟被告知有火灾的时候，他们唯一的冲动是乘坐黄包车尽可能安全地接近火场去看热闹。这并非是像观看电视上闪过的关于世界另一端的一个灾难的简短新闻时的那种距离——而是她的殖民者身份带来的感情距离，建造在中国土地上的一小块外国飞地是阻挡移情作用的障碍，这种障碍使殖民者漠视自己生活于其中的那些人民，而这种障碍之所以可能存在，不仅是由于殖民者政治上的优越感，也因为那种伊莉莎白在叙述中从没有质疑过的、不言自明的文化优越感。

如果我们将此再一次与他未收到的信件》(Briefe, die ihn nicht erreichten) 相比，我们会看到相似的情景有极不相同的描写。²⁵让我们看一段

²⁴ David Spurr *The Rhetoric of Empire* Durham and London 1993, p. 25.

²⁵ On the reader implicit in fictional autobiographies, see Wolfgang Iser *The Implied Reader: Patterns of Communication from Bunyan to Beckett* Baltimore/London 1974, pp. 124-134.

这部小说再现北京穷困人口在冬天的惨况的描述。冯·海靖 (Von Heyking) 首先把穿得很好的富人与挨冻的穷人区分开来，接着描述了后者的苦难，这实际上是恳求人们承认共同人性：

那些是富裕者，他们能够抵挡严寒，但是在小货摊和小吃摊之间的乞丐桥上，却有一群可怖的人；一些人半裸着，瘦弱的身躯在严寒中瑟瑟发抖；我们看到了凹陷的脸，蓝色的嘴唇，在严寒中冻得半死的紫色的四肢，各种各样的创伤和残疾，粘着污秽物的头发，精神失常般的眼神。由于他们的污秽和受到的难以言表的忽视，你几乎无法称之为人类。而且他们当中的许多人还很年轻，还是孩子，他们一定曾有个母亲！这许多的生命还不如根本没活在世上好，他们的悲惨境况看起来更可怕，因为显而易见他们的生活完全没有希望。²⁶

体裁问题再一次显得极为重要。在小说的时间框架里，1900年6月底，北京的情况正接近危机点，所以这段令人心碎的倒叙与叙述者逐渐加深的绝望感是和谐的。很快她就会得到确认，她所爱的男人在义和团运动的最后阶段被杀死了。因此这段关于痛苦的再现存在着某种矛盾性。一方面，小说进程确实需要这样的描写以加深读者的沉重心理。另一方面，这种感伤在同时代的关于中国的德国作品如此例外，这是唯一的一次，中国人作为值得同情的对象清楚地进入了德国读者的视野。

再现城市贫穷人的痛苦是19世纪最后十年德国自然主义文学运动中的一种风尚。²⁷这种风尚一直延续到20世纪早期，但是怜悯的对象总是德国下层社会。冯·海靖 (Von Heyking) 大胆地把熟悉的词汇移换到北京的情景中，这一做法不应该被低估，因为同时代描写中国的德国小说从未试图思考过，中国最没有特权的人群的苦难与肮脏同德国下层社会的贫穷状态有什么相似之处。

人们不禁要问，伊莉莎白用极少的言词就那么生动地捕捉到了缫丝厂工人们悲惨的命运，为什么她就不能给予他们片刻的同情，或者她为什么甚至不能问一问，那些因天津火灾而无家可归的人在哪里可以找到避身之所。但我们不是要将伊莉莎白带到道德法庭上，一部成功的情感小说也不能被当作证据来抨击这一辑不是为市场制作的个人信件。

冯·海靖 (Von Heyking) 在接近小说结尾的地方突然关注北京的悲惨者，这与她在此书前边部分对殖民主义剥削的尖锐批判相吻合，但是两者都在为一个与社会分析没有关系的情节服务，这个情节试图操纵想象中的读者的感受，使之走向一个根本不具有布莱希特风格 (Brechtian) 的结尾。相反，布莱希特 (Brecht) 会努力反对《他未收到的信件》(Briefe, die ihn nicht erreichten) 一书，因为它们的目的正好是通过让读者沉浸在结尾的伤感中，来“耗尽”读者对于它们可能唤起的社会问题的任何感受或疑问。

²⁶ *Briefe, die ihn nicht erreichten*, p. 225f.

²⁷ Walther Killy (ed) *Literaturlexikon: Begriffe, Realien, Methoden* Gütersloh/München 1993, vol 2, p. 148ff.

伊莉莎白的解放寓言

正如已经强调的，伊莉莎白的中心兴趣是要在天津建立一个士瓦比家庭，当她记述中国的时候，是因为一些处于边缘的事情引起了她的注意，比如城市中的巨大火灾。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有意省略中间地带，因为如果对照中心和边缘两方面来看的话，会更容易接触其所产生的体裁问题。

伊莉莎白是德国上层中产阶级未婚女性的典型。她的兴趣和成就绝不会偏离她所属的阶级规定的、可以接受的界限。她虽然去了别的国家。但这并不意味着她改变了她的社会环境，因为在中国的德国移居者社会为她提供的社会环境几乎是国内社会环境的翻版。关键的是这个“几乎”。因为地域的变换使得她在中国期间可以进行吸引人的冒险，尽管对具有 21 世纪眼光的一些厌倦了旅行的人来说，这些所谓的冒险根本不算什么。

从 1913-1914 年的家信中可以看出伊莉莎白的目标是将士瓦比的生活方式移植到天津，而且毫不妥协。因此让她困扰的不是社会问题而是她的中国厨师，厨师极尽全力也不能完全理解她的意思，而她却要厨师像她在士瓦比的家仆一样按她的意思来烹饪，这只能一再引起她的挫败感。写家信成了弥补挫败感的重要工具。在信中她可重新肯定自己的文化优越感，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她对家信赋予了巨大的价值——它们是她自己在远洋的成功故事的证明。简而言之，她的叙述总体上是一种身份的实现，这种身份对她来说与她留在斯图加特的身份有重大不同。

正如早就提到的，她非常注意确保她的母亲在她回家之前用心保存好她全部的记述，因为这批信件将是她对这段经历的“美好回忆”。²⁸这封信是在她到达中国大概四个月之后写的。她已经有时间去评价她周围的环境，并且她相信她的记忆将会是“美好的”，这个决心同她决意要让她的中国厨师掌握士瓦比烹饪方法一样坚定。事实上，任何不愉快的事情，不管是“仆人问题”还是边缘问题，“边缘”在这里是指让她面对中国的大多数事情，伊莉莎白通常的反应就是回避，或者是身体逃避——如对待缫丝厂或京剧那样，或者是缩进殖民心态的优越感，如她笔下的中国宴会、火车站的情景或天津的火灾那样。

有意思的是，不愉快的事从未发生在中间地带即德国移居者社会。很可能这中间地带是她的个人解放史发生的地方，而这似否又与罗曼史有极大关系。1914 年 3 月，来到中国五个多月后，她以幽默的口气向她的母亲讲述，她收到了一位年长她约十岁的商人 Strufe 先生的示爱：

从上海开始，我们不断结交新朋友，并且一位我在船上认识的 Strufe 先生乐意与我通信联系。我们相处得很好并在一起度过了许多愉快的时光。他在天津停留了八天，而且在一天晚上邀请瓦尔特 (Walter) 和我去他住的旅馆做客。第二天晚上，我便收到了一封信，在信中他明确示爱，并请求我在以后的日子里与他通信……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

²⁸ Letter of 1 February 1914: „ Du hebst mir die Briefe doch alle auf, gelt! Es ist doch eine schöne Erinnerung für später. ’

看起来不那么年轻—我现在想来，是 38 岁，但是伊莉莎白·傅赖义是不会很快轻易地陷入爱河的。我给他回信时也是这么说的，我们需要彼此更好地了解。你知道，妈妈，这是一封很难写的信—你了解我是怎样的人—但是我设法写了。我让Walther先读了读，因为信里面没有什么秘密。我用幽默的心态来对待这整件事，这后来证明是我所能做到的最好的办法。因为昨天我已经收到了他的另外一封来信，语气很愉快，他在信中同意我信中所说的话。他现在正在回家休假—或许他会在他妈妈居住的汉堡找到某个不错的女孩。回家后会有那么多选择—长时间在外的人们忽略了这点。但我们将继续通信—我很高兴这样做—但是当然不会经常写。写信是没有危险的，妈妈，对这整件事，我的心极其平静。在这儿我被宠坏了一—我已经 28 岁了并且非常明智，这是一件好事情。所有的年轻人和单身汉都为我疯狂，这真是太有趣了。²⁹

这封信写于她纲领性地声明她所有的中国记忆都将是美好的之后一个月，揭示出在她自己所定义的成功意义上，她是一个精明的战略家。首先来看结局：她沉迷于她对殖民地的男士们所产生的吸引力上，尽管她已经 28 岁了，如在国内，这个年龄的她是不可能得到如此多奉承的。在她最后一封被保存下来的信中（1914 年 7 月），她仍旧在玩着同样的游戏。她因吸引了一个“确确实实小我四岁”的官员的注意而欣喜。³⁰

这一游戏在她到达天津后不久便开始了，她向母亲言不由衷地评论道：“在这儿真的让人感到尴尬，因为所有人都认为我那么年轻，二十或二十二岁。这确实令人好笑，但是我不会特地去纠正他们—他们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吧。”³¹她作为未婚女人的身份，加上不用为经济需要而结婚，同时她的哥哥又是最值得尊敬的男性保护者，这使得她处在一个与在斯图加特不同的环境当中，变成了一段重回青春的经历。

Strufe 先生的关注让她感到惬意，如果在国内，她或许会被诱惑而更严肃地对待他的追求。但是她已经准确地估计了她的处境，并且察觉到这个处境会带给她什么。在某种意义上说，她把在斯图加特家中的安全合适的位置交换为在中国的德国社团中同样安全合适的位置。但是她又意识到意味深长的变化，这些变化对她有利，并且有助于她的积累几年宝贵回忆的项目。

她以少许讽刺来对待“重回青春”，因为她知道她在中国的仰慕者们和追求者在德国家乡会有宽广得多的选择范围，可以在和她同一阶层的真正年轻的女孩中挑选。更重要是，在国外她不用在母亲、婆婆或丈夫的监督下来料理自己的家务。她的哥哥瓦尔特(Walther)似乎是温顺的化身。在六月份，她能够这样向家里汇报：“今天上午当我在我的家中走动穿行时，我第一次感到十分满意—因为我第一次没有喝斥什么人”³²—这是一个高潮，一个从一开始就是她的目标，这一目标经常通过“仆人问题”的新变体困惑她，但她终于成功了。她现在可以在自己的

²⁹ 1914 年 3 月 30 日的信。

³⁰ 1914 年 7 月 7 日的信。

³¹ 1913 年 10 月 8 日由天津寄来的信。

³² 1914 年 6 月 16 日由天津寄来的信。

家中随意走动而不会发现任何不合格的东西。她终于把自己想象中的士瓦比的家分毫不差地移到了天津。就此而言，就比较容易理解为什么婚姻前景不大能引起她的兴趣。她在家乡斯图加特有个安全的家，但在那里她不是家庭的女主人。她非常喜欢与有资格的绅士们调情，但是他们的奉承却不会带给她在中国享受的独立。她知道这种社交活动不是一生的事业，但这却是她家乡斯图加特的同侪们无法尽情享受的一段插曲。

她的解放事业在两个重要的方面得到了强化。由于缺少竞争性，她的魅力增强了。第二个强化因素来自于她能够作为歌手和音乐家而闪耀于社会中的能力。她在刚到中国的时候，曾骄傲地记述，她的艺术造诣在居住天津的德国女孩中无可匹敌：“现在，我已经做了很多来让他们感到愉悦，这在最后他们对我的感谢中流露出来。当然，一个人如果有些东西来奉献，就会感到快乐——其他女孩则没有什么可表演的。”³³

她向她的母亲汇报了她在音乐上取得的一连串成功，到1913年十二月的时候，她自信心已无边无际：“我的名声已传到了北京。如果我去那里的话，将会是非常美好的。我在这里是名人了，你也很高兴，是不是？人们希望我在新年前夜的舞会上再次表演，但是如果我们不在这里的话，不表演也没什么。”³⁴1914年七月，她记述了由领事馆举办的、有德国海军军舰伊尔蒂斯号的军官们参加的舞会。几天后当她去向军舰挥手告别的时候，军官们邀请她到船上参加告别酒会。正如她惊叹的语调所清楚表明的，这是她社会成功的至高点：

天津所有的官员，整个领事馆的人和所有其他绅士都在那儿——我是在那里的唯一的女士。我逐渐地正在变成一个厚脸皮的小魔鬼！这来自于我的成功——真的，对所有这些来说，我的年龄已经是太大了，但是这只是就年龄而非就感觉而言。在家里，我早已经被束之高阁，但在这里我突然间又年轻了。哦，生活真的很美好，妈妈！今天我正出发进行另一次旅行，一想到这我的心就剧烈跳跃。你也为我感到高兴，是吧，妈妈！³⁵

不幸的是，伊莉莎白的保存下来的信件到1914年7月便结束了。否则的话，会看到她是怎样应付导致她撤离并最后于1915年早期经由旧金山回到德国的那些事件的，那会是很有意思的。清楚的是，她已发现了“厚脸皮的小魔鬼”——她猜测它潜伏在她身上，然而，她所做的一切并没有打破她的社会地位所规定的任何惯例。她欣然享受的解放在家乡斯图加特是不可能的，但在中国她却可以获取它而无需跨过体面的边界。她只需充分利用她的决心、音乐天赋及在华德国社会的限制性环境所提供给她东西。

让我们回到体裁的问题上，伊莉莎白写了她自己的成功故事，流畅地、生动地要求翻新的身份认同，但是却从没有越出她与她的母亲/家人所共同拥有的期待视野。语气从一开始就是自信的，并且到信件中断的时候已经达到了一个顶峰。

³³ 1913年10月14日由天津寄来的信。

³⁴ 1913年12月9日由天津寄来的信。

³⁵ 1914年7月7日由天津寄来的信。

这就是为什么与《他未收到的信件》(Briefe, die ihn nicht erreichten)一书进行比较是有启发意义的。一篇明确是小说而另一篇则声称不是小说。冯·海靖(von Heyking)将她在在中国的很多真实经历用到了她的小说当中;我们只是不能确定伊莉莎白的信件中是否有虚构的成分,如果有,它们会是什么。

书写中国,书写伊莉莎白

伊莉莎白的家信引起了一些关键的方法问题。历史研究常以私人信件为辅助资料。问题在于,在多大程度上这样的“第一手报告”早已被教育因素和社会环境所预先决定?在多大程度上这些信件能够被确认为“真确的原始资料”?

就“第一手报告”的预先决定性质而言,给伊莉莎白·傅赖义的任何叙述贴上“跨文化”标签,都需要极大的勇气。她要把士瓦比移植到天津的决心耗费了她如此多的精力,以至于—只有少许例外—她似乎把她与中国及其文化的较大范围的邂逅当作是长期的“仆人问题”上的变体。适用于烹饪问题的东西很容易延伸到其它地方。在1913年11月的一封相对较早的信中,她宣布了与她自己的烹饪有关的信念、这一信念很适用于她与中国事物间的其他邂逅:“我们吃了一只我自己烹制的野兔。尝起来味道的确不同。仆人们根本不会运用这么好的调味酱。可能如果我再多给他们演示几次的话,(他们能学会)。但是不管怎样,我们在家里的烹饪方法的却更好。”³⁶这种被深深的优越感所封锁的闭关心态,在厨房当中同在京剧当中一样明显。只有在建筑领域似乎有某种开放性,但是这毕竟是家族的专业领域,并且她哥哥对中国建筑的仰慕可能影响了她。

关于将这些信件作为历史“原始资料”的问题,由于这些信件有一个自己独特的议事日程而变得复杂起来。伊莉莎白几乎不“书写中国”同她的主要关注点是“书写自己”这个事实有直接关系。没有必要怀疑她因“仆人问题”而勃然大怒的真实性,因为这样的问题—尽管不太严重—在斯图加特简直是闻所未闻的。在她直接与中国社会的极少几次邂逅中,她的退缩,不管是身体上的还是退入感情上的冷漠超然,可以在当时很多的殖民小说中找到,以至于似乎没有特别理由去质疑它们。遗憾的是,伊莉莎白没有发现自己移居者圈子以外的广阔空间更让人感兴趣,并且没有习惯于对自己记录下来东西进行深思,尽管她拥有用几个灵巧的语句捕捉一个场景的能力。

至于她所描述的中间地带,即移居天津的德国社交圈生活,我们很难判断在她的叙述当中是否混杂着有意识或无意识的虚构成分。难道除了家中不可靠的仆人们和中国城市污秽的街道之外,她所经历的每件事情都总是令人愉快?这就是体裁问题最诱人的地方,因为在她信件中如果有任何什么东西像小说构思一样浑然一体的话,那就是伊莉莎白对移居天津的德国社交圈的魅力生活的描绘。

由于她叙述的是一个供她以后珍贵的、有意识地精心设制的解放故事,一个没有内讧、嫉妒和令人厌恶的事件的国外移居者社团是必不可少的,并且它也这样出现在她的信中。但是,即使承认伊莉莎白的信件有一个目的并且由于这个目的而删除了国外移居经历的某些不愉快方面,这些信件仍然是殖民文化姿态的生

³⁶ 1913年11月28日由天津寄来的信。

动记录，完全可以比肩于后人所著的具有学术超然性的那些关于殖民主义在中国的资料。

（韩威译 朱建君校）

作者简介：

吕一旭 (Yixu Lu) 是悉尼大学日耳曼研究中心的高级讲师。她目前正在进行一项关于美狄亚 (Medea) 在德国文学中的描述与变迁的研究。

古德曼 (David S G Goodman) 是悉尼科技大学当代中国研究的教授。他的新著《中国新贵：未来的领导者，目前的生活》(*The New Rich in China: Futurs rulers, present lives*, 于 2008 年由 Routledge 出版社出版。他们正在共同进行一项关于 1897-1914 年在德国殖民地青岛的中国人和德国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调查，并且即将进行另外一项关于 1870-1937 年间德国人在中国的殖民经历的调查。

联系方式：

Yixu Lu

Email: Yixu.Lu@usyd.edu.au

David S G Goodman

Email: David.Goodman@uts.edu.au